移民岁月 第八期 YI MIN SUI YUE

浙江青年来支宁

刘天明

1959年1月12日，自治区党委和政府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动员青年前往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派政府副主席马玉槐赴浙协商接受安置浙江支边人员之事，经宁夏、浙江两省区商定，从1959年开始，5年内从浙江省动员30万名青年支援宁夏建设。随后宁夏回族自治区安置来宁建设人员委员会成立，马玉槐任主任，民政厅厅长刘震寰任副主任。安置委员会办公室设在民政厅，川区的中卫、中宁、吴忠、金积、宁朔（青铜峡）、灵武、永宁、银川、贺兰、平罗、惠农11县市建立了安置委员会及办公室，有一名副县（市）长主管接收安置工作。根据中央决定和两省区协议，浙江省陆续动员了一批思想进步、有文化、有技术的男女青年来宁参加建设。5月4日，首批浙江支边人员（俗称浙江青年）乘专列来到宁夏。之后陆续分批来宁，1959年来宁50000余人，1960年来宁40000余人，两年共接收安置浙江支边人员96793人（内含家属17126人），男女比例大致相等，平均年岭不足21岁，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有21000余人，占总人数22%。

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十分重视安置工作，事前多次开会研究，各市、县都认真进行准备。自治区各级政府根据“以农为主”“分别归口”和“大分散、小集中”的安置原则进行安置。浙江支边人员中安置到11个县市农村建立873个安置点（即浙江青年队）。实行在人民公社领导下“独立核算单位”，从事农业生产的50175人；安置到10个自治区国营农牧场当职工的35118人；原系国家干部和职工的对口安排在国家机关、工业、交通、教育、卫生、水利、文化等部门的11500人。据统计，各县市从当地公社划拨出12万亩基本农田，使安置农村的浙江支宁人员均有2.7亩农田耕种，并调拨出生畜4900多头，各种农具600件及一批生产中所需的种子和化肥。从东北、上海等地调运了8000多立方米木材，17000多平方米玻璃，新建了一批房屋，各安置地区又动员农民腾出了2万余间房屋，以供支边人员居住。各安置地社队还将划拨给安置点的土地进行了翻耕，并代种了小麦。自治区拨出专款，作为支边人员的定期生活补助，每人每月15元，家属每月10元，以解决浙江支边人员刚来时的生活困难。自治区财政拨出安置经费，按每人平均400元开支，用于安置当年浙江支边人员生产补助（农具、耕畜）、生活补助和维修房屋。这些准备工作为浙江支边人员在宁夏安家落户，迅速投入生产建设，创造了一些必要的物质条件。

1960年，宁夏连年受灾，经济困难，城乡群众皆进入“低标准，瓜菜代”生活阶段，这对刚刚来宁毫无积累的支边人员来说，生活更加困难。一些支边人员曾发生了浮肿、干瘦病。许多浙江支边人员变卖了衣物，作为路费返回浙江或外流新疆、青海等地。尤其宁夏错误开展了“反坏人坏事”“反地方民族主义”运动，运动中，错捕、错判一些浙江支边人员，加上生活困难等因素，曾发生非正常死亡1300余人。“双反”事件在这些支边人员中产生了恐惧心理，思想更加波动不安，促使浙江支边人员大批返籍外流，截至1961年6月，浙江支边人返籍外流达8万余人，占浙江支边人数的84%，其中安置在农村人民公社的返籍外流48000余人，占安置农村人数的96%；安置国营农牧场的返籍外流28000多人，占60%；安置工矿企业单位的返籍外流5000多人，占49%。其中包括经单位批准资助路费,返籍探亲未归的3万余人。截至1963年，浙江支边人员留在宁夏的不足1万人。宁夏难以留住移民,浙江、宁夏两省区中止了从浙江迁移青年的计划。

总工程师的人生经（一）

宁夏政协移民资料征集组

2020年9月8日，我们在西夏区某小区采访了长城机床铸造厂蔡文礼老人。蔡老祖籍吉林通化，1960年考入吉林工业大学（现合并于吉林大学）铸造专业。夫人张问秋，吉林辉南人，他们俩是同班同学。1965年大学毕业，分配到沈阳中捷友谊厂，在那实习了一年，1966年12月到银川。蔡老说：“这个日子忘不了。”

蔡老回忆了他们从东北来到宁夏的经历。1966年，他们从沈阳直接来宁夏。当时文革正搞大串联，没有直通车，就从沈阳到北京，再由北京到呼和浩特。红卫兵大串联，火车上人太多下不来，是从窗户爬下来的。之后，也不知道上哪辆车，就在呼和浩特等着，三四个小时之后，再坐上车继续走。当时来的时候有好多职工带着家属，一过包头，荒芜人烟的景象，一些家属在车上就掉眼泪了。

到银川，感觉也很荒凉。他们被接到银川老火车站旁边一个小旅馆，条件很差。第二天去新市区，路面是石子铺路；厂里没有车，就用大卡车把他们拉到老城，让他们看看银川市啥模样。他们感受最深的就是玉皇阁和鼓楼建筑，到玉皇阁顶上看银川市，整个是一片黄土。那时候的银川还是泥房，当时银川市只有5万人。饮食方面，他们俩不吃羊肉，但天天都是羊肉臊子面，没办法就弄点饼子吃。

当时长城机床铸造厂，利用了宁夏老党校的旧房子。听说还要建一个西北拖拉机厂，但最终没有建成，他们就住在这个房子里。那些房子建筑，全是干打垒。建长城机床铸造厂，是机械工业部的规划布局。他们来宁夏前，说是厂子马上要进行试生产。来银川后，厂房才盖半截，房顶还没封顶呢。他们参加建厂的劳动，什么都干，埋电线杆子、拉电线、扛水泥、挖地沟等。“来以前就知道条件艰苦，但年轻人有那么一股子热情。”蔡老说，“我们的经历就跟电视剧《激情燃烧的岁月》里的故事差不多，只不过人家是搞原子弹，我们是搞三线建设。”

1970年，长城机床铸造厂开始试生产。当时，调配过来的技术人员、工人，包括他们这些大学生，还不到100人。其余都是在宁夏招工，到外边去委培。除了他们1966年来的这批人，1970年又调来了一批，各个部门都有，各类人员大致配全了。长城机床厂建设初衷，是要按照西方的建造模式，建成托拉斯式11个厂，就是各种厂子都有。实际上建造了3个厂，文化大革命开始都停了，就建了大河机床厂、长城机床厂和他们这个厂，本来筹建的时候叫长城机床铸锻件厂，结果锻造就没有了。分别在长城机床厂、大河机床厂搞个小锻造，生产的部件供他们自己用。1980年之前，他们做的铸件就提供给大河机床厂、长城机床厂。计划经济时代，一年的铸件也就四五千吨。价格由重工业厅定，没有钱了，重工业厅出面要两个厂给他们补助一点，亏损了十几年。要追究亏损原因，价格是政府定的，1吨铸件才800块钱。那时候铁也便宜，一吨二三百元。上世纪80年代之后，他们感觉到这种体制不行了，就得上市场上找活去，不能长城机床厂和大河机床厂两家说多少就多少。于是，他们就开发了国内市场，包括到浙江、云南、陕西、辽宁，辽宁就是沈阳和大连。当时就杭州机床厂、宝鸡机床厂、云南机床厂等7家，他们与这些厂家建立了联系。原来只供两家，现在是7家。机械部设计的产量，就是年产1万吨。蔡老说：“到1985年，我们设计产量不断提升，日子就好过了。当时市场经济，给外边的价格我们可以商量，不是政府说了算。这是我们从宁夏单独的市场走向国内市场，实现我们铸造厂跳跃性发展的时期，就是说挣上钱了。”

1984年，长城机床铸造厂换了新一届领导班子，蔡老进入班子。1984年厂长是陈中秋，调到湖南，回老家了。1985年，副厂长孙文靖正式担任长城铸造厂的厂长，蔡老出任总工程师，一直到2004年。后来又有几个年轻人进入班子。这一个过程，就是长城机床铸造厂按照三线建设发展要求，想生存就得更新理念。更新理念，就得真正换成市场经济，这是走第一步，开发国内市场。1986年，第一次实现长城铸造厂扭亏为盈。蔡老说：“那一年挣了300多万元，腰杆也硬了一点，盖了个小办公楼，原来我们在小平房里办公。”1986年，他们这个厂就改名为长城机械铸造厂，长城机械铸造厂和宁夏柴油机厂实际是兼并，但为了好听叫重整组合。蔡老干了9年柴油机，一直到1994年，他既干铸造，也干柴油机。他认为这届领导班子，特别是孙文靖在企业管理上比较有气魄，发展思路比较新颖，这届领导班子先实现了扭亏为盈。然后联合宁夏柴油机厂，最后组成了长城机械铸造厂，这是发展的第一个阶段。

第二个阶段，就是我们想做得更好一点，尽管1979年以后已经是改革开放了，但他们新盖一个厂房没有钱，要考虑发展。他们找到国家计划部机械司，希望能给长城机床厂贷款。当时部里的产品有一些已经出口了，但长城机床厂不行。在部里看来，你连厂房都没有，怎么能签合同呢？实际上，当时有一部分新产品已经向日本出口，他们这届班子一个是要适应市场经济，再一个是必须提高技术水平。

（薛正昌 杜恩东 整理）

一块意义特殊的墓碑

——记宁夏大学支宁教师闪一昌

周瑞娟

在北京市昌平的回民公墓，有一块不同寻常的墓碑，说它不寻常，是因为它是一块双面刻字的墓碑。碑的正面是儿女的名字，背面密密麻麻刻着墓碑主人30多位学生的名字。闪一昌老师的这些学生如今已双鬓斑白，但他们对自己的老师依然一往情深。

支教宁夏 无怨无悔

闪一昌是北京回民学院的教师。1958年9月，闪老师和她100多名毕业班的学生一起登上了开往银川的列车。闪老师这次西行，还带着三个不谙世事的孩子，最小的女儿才刚过周岁，还不会走路。闪老师是一个单身母亲，由于特殊年代的政治运动，丈夫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被迫离开北京劳动改造，抚养孩子的责任全部落到闪老师身上。她没有被生活的困苦击垮，心态依然积极乐观。选择到宁夏支教，开拓新的事业空间，这让闪老师得到极大的安慰。到银川后，闪老师分到宁夏师范学院（宁夏大学的前身），她的100多名学生被分配到宁夏各市县的中小学。

捧心为灯 播洒阳光

1958年的银川，生活条件非常艰苦。凭着对教育事业的热爱，闪老师义无反顾地投入到教学工作中，开始在宁夏的新生活。闪老师住在学院后面的平房里，她休息时经常有学生到家里请教：“闪老师，我怎样确定论文的主题？”“闪老师，这篇古文里的几个字我翻译的不准确，请您再给我讲一遍。”每当这个时候，她都会放下手边的事热情接待学生，哪怕她正在吃饭，也会放下手中的碗筷给学生讲解。

上世纪60年代，白天学校的活动多，晚上会议多，为了不影响教学质量，闪老师只能在夜间备课和批改作业。据当时学校的校工说，闪老师是学校里最勤奋的老师，她家的灯亮得最早，熄灯最晚。她把全部心血都放在学生身上。除了学院的教学任务，闪老师还经常到宁夏各区县去讲学，宁夏各地到处都留下了她辛勤的足迹，她教过的学生已遍布全国各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从北京、上海、江苏、陕西、甘肃、新疆等地学生经常给闪老师写信：“闪老师，我时常想念您，想念您为我们上课的美好时光……”闪老师生前一直珍藏着学生从祖国各地寄给她的信件。1994年，闪老师去世后，大女儿高虹一直保存着这些信，“这是对妈妈最好的纪念。”

当时与闪老师一起来宁支教的回民学院的同学只有少部分留在了银川市，大部分同学被分配到了其他市县，其中有些学生还被分配到艰苦的南部山区。当时，这些学生也只有20岁，闪老师非常关心在宁夏各地教书的学生。她在银川的家就成了学生们共同的家。每当休息日，总有学生到闪老师家过周末，来看望闪老师，并请教教学方面的问题。她鼓励学生安心教学，毫无保留地把教学和带班的经验传授给她的学生。

闪老师的学生以好为榜样，短短几年就成为所在学校的教学骨干，后来有的当了校长，有的担任教导主任，有的还走上了更高层次的领导岗位，他们用青春为宁夏教育事业撑起了一片湛蓝的天空。他们没有辜负闪老师的殷切希望和教导。

春风化雨 桃李天下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春回大地，宁夏的教育系统逐渐恢复了正常的教学秩序。闪一昌老师被任命为宁夏教育学院的院长。走上了领导岗位，但她还是离不开热爱的三尺讲台。在庞杂的行政事务中，闪老师尽量抽出时间，给学生上课。钻研教学业务是她的最爱，也是闪老师最感兴趣的事情。在师生的心中，走上领导岗位的她依然是学生心中那位可爱可敬的闪老师。

闪老师独自抚养大了三个孩子，尽管生活充满了坎坷和艰辛，但她依然坚毅、阳光充满慈爱。她把“小我”变成“大我”，把小爱升华为大爱。把毕生的爱奉献给她挚爱的教育事业和她的学生，让自己的人生价值在奉献中得到最大的体现和释放。

闪老师的墓碑上雕刻着这样一行字：悼恩师闪一昌：“以青春献教育，以教育奉终身，做民众之公仆，乃公仆之楷模。”这是学生们对闪老师发自肺腑的真诚评价。

60年来，闪一昌老师的学生将根脉深深扎入宁夏这片黄土地，他们被分配到宁夏的固原、西吉、海原、泾源等十几个县的中小学。这些受过新式教育、从首都北京来支教的年轻老师，融入当地的乡村，有些学生在当时落后、艰苦的西海固地区的农村小学一干就是二三十年，青丝变白发。他们用生命培育的一茬又一茬的青苗茁壮成长，成为社会的栋梁之才，宁夏新一代有文化的人。跟随闪老师从北京来的学生都已退休，但他们培育的第二代教师活跃在宁夏的教育岗位上，他们延续着老师的梦想，成为建设宁夏的中坚力量。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闪老师把她的一生的爱都交给宁夏，交给了她的学生，燃烧了自己，照亮了他人。她种下的慈善的种子转化为爱的力量，她的学生又以感恩的方式传递，让教育这棵大树生生不息，绵延不断。

闪一昌老师平凡而又充满激情和奉献的一生，为后人带来了太多的感动和启迪，让我们感受到了生命的意义和价值的永恒。

（作者单位：宁夏广播电视台）

往事回顾

胜利会师将台堡 三军共启新征程

雄伟的将台堡红军长征会师纪念碑，矗立在宁夏固原市西吉县东南30公里处的葫芦河东岸。纪念碑顶端，象征红军三大主力部队的3位红军战士，目光坚毅地眺望远方。

在将台堡红军长征会师纪念碑前，讲解员唐睿楠向记者讲述了红军三大主力部队胜利会师的故事。1936年7月，为了打破国民党阻止红军会合的阴谋，中央军委决定：红一方面军以一部分兵力保卫苏区，主力挺进西兰公路，占领海原、靖远、固原及其以南地区，策应红二、四方面军作战；红二、四方面军兵分两路，红四方面军为左路，占领岷州、武山等地，继续向东向北进军；红二方面军为右路，东出甘南和陕西南部，建立苏区，以实现红军3个方面军的会师。在左路军进军固原的同时，西征红军右路军（红15军团）沿同心、兴仁堡方向西出，以保证三大主力会师右翼的安全。在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正确领导下，红一、四方面军于1936年10月9日在甘肃会宁实现胜利会师。

1936年10月17日，红二方面军从甘南北移顺利抵达静（宁）会（宁）地区。21日，红二方面军长征进入今宁夏西吉县。当日，红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政委任弼时、副政委关向应和随红二方面军行动的原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在平峰镇与红一方面军一军团代理军团长左权、政委聂荣臻、政治部副主任邓小平等亲切会面。

1936年10月22日，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红二军团经滥泥河到达将台堡，同红一方面军第二师胜利会师。红二方面军领导人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刘伯承和红一军团领导人左权、聂荣臻、邓小平以及红二师领导人杨得志、肖华等参加了会师。鉴于将台堡会师是红军长征最后会师地，10月22日被确定为红一、二、四方面军胜利会师纪念日。

参加会师的部队有1.15万余人。“在这次会师现场，红一师三团政委肖锋代表红一方面军把数万斤粮食、5万块银元、牛羊等物资赠送给红二方面军。贺龙总指挥笑着对肖锋说：‘谢谢红一方面军同志的关怀，多年来盼望见到中央红军，今天终于实现了。’”唐睿楠介绍。

据西吉县文化馆馆长刘成才介绍，1936年10月22日21时，红一军团领导人左权、聂荣臻、邓小平给毛泽东发来电报，报告了与红二方面军领导人及红二军团、红六军团并红三十二军领导人会面和慰劳部队的情况。随后，会师部队集合于将台堡东侧的空地上，举行了规模盛大的联欢会，欢庆会师。很多红军战士相拥而泣，载歌载舞。

如今，在将台堡所在的西吉县，广为流传着“红军粉”的故事。原来，北上的红军战士中有不少擅长制作粉条的南方人，他们手把手教当地群众将马铃薯搅碎，用石磨磨面，再经过沉淀、过勺、水煮、晾晒等12道工序后，制作出了透亮筋道的粉条。粉条的出现，既解决了当地马铃薯不易保存的问题，还帮助群众实现了增收，被当地亲切地称为“红军粉”。记者在西吉县兴隆镇王河村见到了“红军粉”第四代传人、今年44岁的马正龙。“从我太爷爷时候开始，我家就一直在做粉条。现在，我们成立了‘正龙三粉’（粉条、粉丝、粉面）合作社，一年有10多万元收入。”马正龙笑着说。

在短暂的欢庆活动之后，红军又开始准备新的征程——拯救处于危难中的中华民族。1936年10月24日，红一方面军一军团政治部副主任邓小平在将台堡向红二方面军营以上干部传达了党的瓦窑堡会议精神和毛主席《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并做了关于统一战线等问题的报告。红二方面军的将士当即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的政策！”贺龙听了报告后高兴地说：“这下好了，从此以后我们就可以在毛主席的直接领导之下了。”三大主力在红军将台堡会师后，实现了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团结和巩固了全民族抗战的中坚力量，促成了中国革命从转折走向胜利。

（据《经济日报》）

盐池革命烈士纪念塔

李林伯 张泽锋 整理

1936年6月21日，西征红军解放了盐池县城，随即建立了苏维埃政权，自此，盐池成为陕甘宁边区的西北门户和前哨阵地。盐池人民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反侵略、反压迫、打土豪、分田地，发展党、团组织，出人捐物，支援抗日。组织成立地方武装、游击队，打击还乡团，痛击马鸿逵部的侵扰，支援解放宁夏。10多年的峥嵘岁月，盐池人民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许多人为保卫祖国、保卫家乡，解放全中国献出了年轻的生命，英雄事业可歌可泣，百世留芳。

为纪念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死难的烈士，铭记革命先烈的英雄业迹，教育子孙后代。全国解放后，中共盐池县委、县人民政府决定修建革命烈士纪念塔。

纪念塔位于盐池县城内东南角。始建于1952年4月，当年竣工。塔身用青砖砌成，塔形呈八棱锥状，高18米，塔北面正上方镌刻着宁夏省人民政府主席邢肇棠的题字“烈士纪念塔”。塔底壁四周镌刻着中共宁夏省委、省人民政府、省军区、中共盐池县委、县政府的题词和部分烈士名单。

宁夏省委题词是：创造与保卫陕甘宁边区的烈士们是劳动人民和共产党的优秀儿女。我们要继承先烈遗志，建设好盐池县老根据地，建设好可爱的祖国。

宁夏省人民政府题词是：驰骋疆场争解放，保卫锦绣山河，抗强敌，反内战，英雄事业可泣可歌。功在国家名垂千古，勒石纪念，永世不灭。

宁夏省军区题词是：英雄们的鲜血灌溉了中国人民自由之花。

中共盐池县委题词是：烈士们斗争的精神永远和中国人民共存。

盐池县人民政府题词是：革命先烈的伟大功绩永远铭记在中国人民心中。

纪念塔底座四周建有砖砌围栏，栏高1米左右，塔北侧建有烈士纪念馆一座。1977年10月将烈士纪念塔重修一新，塔身增高到19米，用白色水泥粉饰，塔碑正上方镌刻着仿毛体“革命烈士永垂不朽”八个大字。正下方刻有“在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保卫陕甘宁边区的战斗中，在保卫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英勇献身的烈士；功与日月争辉，德同天地共存；言炳丹青留芳，行作后人楷模。英名垂青，浩气长存，虽死犹生，永垂不朽。”塔的周围除保留原有题词外，又补刻了中共银南地委的题词：“高举毛主席的旗帜，继承先烈遗志，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以及银南军分区的题词：继承先烈遗志，为全人类彻底解放而奋斗。”

塔北侧又重新修建烈士纪念馆一座，馆内陈列着70多名烈士的遗像和生平事迹。

1986年纪念馆东移200米重建，为重檐歇山顶楼阁式结构。

1995年4月烈士纪念塔被自治区命名为“宁夏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经常有自治区内外，国内外人士到此瞻仰，追念烈士功勋。

（摘自《宁夏文史资料》第二十三辑）